



鼓楼史学丛书·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英〕麦大维 (David McMullen) 著

张达志 蔡明琼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AMBRI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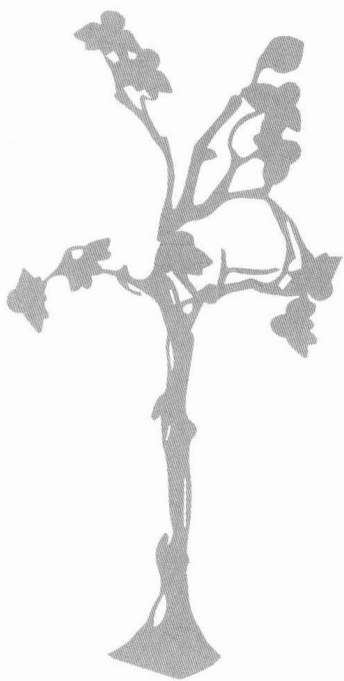
鼓楼史学丛书·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英〕麦大维 (David McMullen) 著

张达志 蔡明琼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AMBRIDGE

图字：01-2017-52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 (英) 麦大维 (David McMullen) 著; 张达志, 蔡明琼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7

书名原文: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ISBN 978-7-5203-3793-9

I. ①唐… II. ①麦… ②张… ③蔡… III. ①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095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9.25
插页 2
字数 478 千字
定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ISBN 0 521 32991 4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9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非常感謝中國同仁將我三十年前的著作翻譯中文，中國古代歷史與古代社會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是我與中國同仁的共同興趣，論語有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學而知之乃是我畢生努力之方向，謹此與中國同仁共勉。

李天維 Dan McManis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於武漢華中師範大學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主编

韩南 (Patrick Hanan)、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麦大维博士此书以“唐代(618—906)中国的主要学术机构”为主题,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学术机构如何为流传至今的大量学术著作提供环境;以及有唐三百年间,知识精英对待学术机构的态度如何发生变化。相关制度涉及教育体系、儒家经典诠释、国家礼制、官修史书、文学作品以及著名的科举考试。唐代前半期,所有制度均得以顺利运行;但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以后,效果却大不如前。学术生活虽未放弃以国家为中心的导向,但却变得更加衰落且独立于官方体系之外。私人的、非官方的撰著逐渐取代王朝前半期官方汇编的重要地位。

原著致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要感谢诸多同事和朋友。首先，最为感激的是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教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剑桥的汉学教授，他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并一直对我关照有加。他为我们理解唐代思想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下文将提及他在这一领域的著作对本书结构的影响。此外，他还通读这一研究的初稿，并提出简明扼要、极具洞察力而又颇为恳切的建议。

本书也是杜希德（D. C. Twitchett）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授意我为《剑桥中国史·隋唐卷》下卷撰写《唐代儒学》一章的间接成果。杜希德教授善解人意地听取我的观点，在审读初稿之后，又给予许多无私的帮助和宝贵的建议。还有许多其他朋友和同事也阅读了初稿，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他们包括：史乐民（Paul Smith）博士（哈弗福德学院）、柏清韵（Bettine Birge）女士（哥伦比亚大学）、柯维麟（Michael Quirin）博士（波恩大学）以及我的剑桥同事鲁惟一（Michael Loewe）博士和巴瑞特（T. H. Barrett）博士（现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史教授）。

1980年，我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下，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数月。在那里，我的朋友礪波護（Tonami Mamoru）给予了极大帮助，除阅读建议外，还知无不言地回答我无数的问题。其后，我从日本前往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得以参观许多以前只在书中见过的地方。尤其感念山东大学已故王仲荦教授的恩赐与襄助，将其收藏的大量原始拓本供我参考。

从着手研究此问题以来，大量专著相继出版，使得唐代中国制度、知识及文史领域的研究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所尝试总结的唐代儒学传统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重要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关于唐代诗歌的著作，魏侯玮（Howard Wechsler）教授新近出版的关于七世纪国家礼制的专书，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对韩愈的研究，以及巴瑞特教授对李翱思想的探讨，都在改变着以后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方式。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杜希德教授，允许我拜读并引用其即将问世的大作《唐代官修史籍考》第一章的草稿。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唐代知识、学术及文史奠定了新的基础。

邓海伦（Helen Dunstan）博士（澳洲国立大学）和我的兄长麦振国（James McMullen）博士（牛津大学）都将自己的课题放在一边，对本书的倒数第二稿作出细致而有建设性的评论。此外，本书的完成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莎莉（Sally）无与伦比的耐心和协助。不过必须承认，概述长达三个世纪的唐代儒学传统仍是一大挑战。尽管得到如此多的帮助，但我依然要对全书结构和内容解释负有全责。

中译本序

麦大维

二十世纪下半叶及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是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在这数十年间，思想、政治、社会、科技所产生的强力影响，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学的追求。上世纪的冷战和热战，交往方式的巨大变化，知识生活的自由风气，性别观念的发展，以及数字革命的浪潮，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并为史学涵盖的所有领域带来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

本书的研究完成于三十多年前，那时这些变化势头正盛。作为撰者，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却不可能时时跟上复杂而又多元的发展。所以，值得将本书置于唐代研究领域新变迭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战后初期，我在北欧接受的传统教育仍是比较保守的。所有弃科学而从艺术、人文的学童都接受了严格的古典学训练，他们自幼即学会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原始材料，特别强调理解语法，甚至要求能够模仿古代经典作家创作希腊文与拉丁文的散文或诗歌。在具备良好的教育之后，古典学是一门极具启发性的学科，随处可见与上世纪诸般问题息息相关的思想。此外，古典学还向学生灌输想象并重构古代历史的信念，以及对古代史料尤其是文本的敬重。不过，在当时的北欧，人们关注的焦点仍是古典地中海以及古典时代以来的欧洲史。而伟大的东方古典文明，包括印度、中国与日本，尚未出现在课程体系之中。

谈及于此，身为本书作者，有必要插叙一些个人细节。我很幸运，从

小学到十七岁高中毕业，一直修习古典学。到十七岁时，已经领略一些主要的古典作家：诸如悲剧作家荷马（Homer），苏格拉底（Socrates）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还有西塞罗（Cicero）、塔西佗（Tacitus）、李维（Livy），以及拉丁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贺拉斯（Horace）和维吉尔（Virgil）。虽则对他们的理解还不成熟，但最优秀的师者仍能传授年轻学子以激越之情。我依然记得阅读西塞罗的演讲、苏格拉底的辩护、维吉尔的诗篇时的那种兴奋。这一阶段我决意在剑桥学习古典学，部分渊于家族传统，部分出于高中时的兴趣。我想，一些中国学者有时认为其外国同行处于劣势，因为他们自幼并未接受文言文阅读的训练，而是直到大学才开始学习。但就我的感受而言，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古老语言的学习和古代文明的探索，为开展东亚历史研究作出了极有价值的准备。

随后，一个非同寻常的好运从天而降。195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有关青年男子强制服役二十三个月的规定已近尾声，但少数通过选拔者仍可利用服役学习俄语或汉语。我自告奋勇地选择学习汉语，在接受了为期十个月的基础普通话培训后，被派往香港从事低阶工作。在香港生活期间，通过与中国青年交朋友，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遗产有了初步的观感，直接改变了我的学术态度。我非常激动地认识到，中国自有其悠久的古代世界，且相关文献记载极其丰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完整记录文化历史的传统绵延不绝，这恰是古代地中海世界所不具备的。因此，我郑重决定由古典学转而申请攻读汉学学位，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对此慨然应允。

在攻读汉学学位的三年中，我第一次热切地立志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那时的训练极为重视古代汉语，课程伊始，我们研习先秦诸子，包括孟子、韩非子和庄子。要求详细解释早期汉语的语法，并能准确地译成英文。在剑桥那时的本科课程中，唐代历史的讲授格外出彩，激起我进一步研究唐代中国的雄心，其后便继续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

此处还应稍事停顿，提示读者1960及1970年代中国中古史研究居于何种地位。在剑桥我们的老师中，有两位唐史研究的巨擘。他们既深入研读唐史的原始材料，又广泛涉猎东亚战前一代杰出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出版的唐史专著，至今仍是这一领域巍然屹立的丰碑。蒲立本教授之《安禄山叛乱的背景》，杜希德教授之《唐代财政》，彻底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中

古中国的认知。能在那时得聆亲炙，我倍感荣幸。

本书起初是杜希德教授宏大的英文汉学项目之一的组成部分。身为一名助理讲师，我应邀撰写《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二卷中关于儒学传统的章节。

事实证明，概述中古学术传统在有唐近三百年的演变轨迹，其艰巨程度比杜希德和我预想的要大得多。当然，该领域的研究基础早已奠定，但既有的大多数研究倾向于遵循传统路径，将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经学、史学等视作更大领域中的独立主题进行分析。然而，对这些单独的子课题进行总体概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源自儒家经典的治国之道已经遍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全部，并同样清晰地植入唐朝国家的制度层面。故此，有意识地将王朝政治态度与国家制度结构进行整合，是本书体例安排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可以显见我东亚学术中获助颇丰。但是我们最好再次暂停，设想一下1960至1980年代的年轻学人有哪些研究工具可资利用。由网络文本和在线数据库引发的学术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才刚刚起步，可用的参考工具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出版的引得和索引。例如战前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或1950及1960年代日本的《唐代研究指南》系列，均是展开论证不可或缺的基础工具。不过，学术研究是一项极为缓慢的工作。1960年代的博士生用老式打字机敲打学位论文，不断的重写改订既耗时费力，有时更是花费高昂。往返东亚的旅程无比漫长，记得1964年我从台湾乘船返回剑桥，就足足耗费了数周时间。

本书的准备工作也深受中国学界重大变革的影响。当我这一代年轻学者开始研究时，还不能访问中国或与中国学者进行讨论。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76年，当时文化革命尚未结束，学术氛围非常受限。直到1981年，我在新的交流计划下第二次访问中国，才得以与中国的唐史学家自由交谈。

这一时期，原始材料主要是墓志铭的大规模整理与出版还处于初始阶段。1983年问世的两卷本图版《千唐志斋藏志》，使更多读者得以利用其所藏墓志。但在此之前，学者只能亲自前去查阅拓片。犹记1981年春我在山东大学查阅拓片的情形，乃得益于著名唐史学家王仲荦先生的盛情襄助。当时由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尚未出版，从那时起，

墓志铭的数量与重要性就在持续攀升。

凡此种种，意味着本书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自出版以来，始于1970年代的学术潮流蓬勃激荡。广而言之，极大扩充的唐代史料现在几乎都能在线获取，足兹检索。唐代研究亦取得长足进步，学术交流和访问、学术会议和工作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资金也更加充足。目前中国和美国都有专门的唐代研究期刊。就我个人而言，已经能够从本书所要求的整体视角出发，对个别议题进行更高程度的集中分析。事实证明，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个人方面，这都更能令人满意。当今西方世界的唐史学家还觉察到另一重要因素：他们的著作正在被大量中国学者和学生进行批判性阅读。我自己也已意识到由此带来的挑战，必须就目前中国学界所关注的诸多专业课题展开更精确、更全面的研究和更具针对性的探讨。在中国的访问使我在研究方法上获益良多，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向中国学者寻求更多的学术建议。因此，听闻中国学者有意将我三十年前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内心充满惶恐与感激之情。尤其感谢北京大学陆扬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张达志教授，正是他们的耐心与宽容成就了这项有益的事业。同时，对于本书英文版中出现的错误，尚祈读者包涵鉴谅。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1
一 中古晚期帝国的儒学	4
二 制度背景	9
三 学术著作分类	19
第二章 学校与祭孔	21
一 高祖及太宗朝	22
(一) 祭孔的复兴	23
(二) 官学的重建	25
二 650年至755年	27
(一) 国庠与乡校	27
(二) 国家祭孔的扩张	31
(三) 私授的发展	34
三 安史乱后	36
(一) 官学的衰退	37
(二) 祭孔子与祭太公	42
(三) 私学观念的发展	45
第三章 经学	49
一 高祖及太宗朝	52
(一) 考证与训诂传统	52
(二) 政策的包容	56
(三) 唐初《春秋》学	58

(四) 唐初对孟子的态度	59
二 653年至755年	60
(一) 对官方定本的批评	61
(二) 对科举经学标准的控诉	64
(三) 刘知幾的《春秋》观	65
(四) 经学的幻灭	67
三 安史乱后	69
(一) 科举经学改革的努力	69
(二) 经学定本的难题	71
(三) 安史乱后的《春秋》学	73
(四) “性命”学者	76
第四章 国家礼制	82
一 高祖及太宗朝	86
(一) 《贞观礼》	87
二 650年至755年	89
(一) 明堂与封禅	90
(二) 《开元礼》	95
(三) 礼制传统与科举	98
三 安史乱后	100
(一) 祖宗祭祀	100
(二) 国家礼制规划的衰落	106
(三) 安史乱后的王朝礼典	106
(四) 科举中的国家礼制	109
(五) 国家礼制传统的批判审视	110
第五章 史学	115
一 高祖及太宗朝	117
(一) 两汉史研究	118
(二) 唐前五代史	119
(三) 贞观后期修史	121
(四) 前两朝实录	123
(五) 典志编修	124
二 650年至755年	125

(一) 经典史注	125
(二) 国史	126
(三) 刘知幾对官吏的批评	128
(四) 玄宗朝国史	129
(五) 官制史	132
(六) 私修史书	133
三 安史乱后	135
(一) 实录相继与唐初理想	136
(二) 对传记的批评	139
(三) 私人修史	141
(四) 短篇史论	141
(五) 科举中的史学	143
(六) 志书论	144
(七) 典章制度	145
第六章 文章观	149
一 高祖及太宗朝	152
(一) 唐初文集	153
(二) 秘书阁	153
(三) 文之廷议	154
(四) 文与唐初选官	156
二 650年至755年	157
(一) 官修文集	157
(二) 四部书录	159
(三) 《文选》研究	161
(四) 宫廷文学宴集	163
(五) 知制诰与待制院	164
(六) 文与科举	166
(七) 开天时期独立文学	168
三 安史乱后	170
(一) 秘书省地位的下降	171
(二) 草诏与政治权力	172
(三) 对科举中写作技巧的批评	175
(四) 文学为学者之“己任”	177

第七章 结语	182
注释	191
参考文献	350
词汇表和索引	381
译后记	447

第一章 前言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王朝统治一直延续未断，依靠的正是儒家思想所建立的一整套世界观、道德观和各项社会制度。无论中国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能够在行政和教育领域挑战这一杰出思想；也没有哪一种思想能像它一样始终被社会所推崇。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绵延不绝的社会奇迹，原因复杂而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儒家思想能够不断适应新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并保持其基本核心始终不变。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儒士都强调其伦理价值与传统经典是永恒的，但他们同样暗示，从相关制度、礼典仪注，到心性与哲学等儒家思想的其他要素，均可赋予重新解释并不断发展。在唐（618—907）及唐以前，官方史家主要从历代国家制度层面思考这一传统，这无疑关乎王朝的繁荣兴盛。而从宋代（960—1279）开始，新儒家尤其重视对历代儒学大师经学思想的记录与整理。近几十年来，现代学者脱离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规范，从更长期的视角洞悉中国文化的持续变化，并通过思想史和社会史两个层面的重要分析不断进化这一传统，对今天理解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及其留给现代中国的丰富遗产，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许多前现代儒家传统文献都隐含这样的观点：自公元前 206 年汉帝国建立，到 1911 年帝国时代结束，儒学发展史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近来几乎所有儒学研究也都明确持有这种观点。第一阶段包括两个伟大的早期帝国，古典帝国——汉（前 206—公元 202），及中古晚期帝国——唐。西汉时期（前 206—公元 8），原始儒学的伦理教化和治国理念与先秦后期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及汉初的法家、道家思想相融合，其思想体系的主要特征即是“天人感应”。这套“天人感应”思想不仅解释并证明帝国统治的